
使美八年 纪 要

沈 剑 虹 回 忆 录



使美八年纪要

沈剑虹回忆录

(内部读物)

世界知识出版社



2 024 9939 5

根据台湾省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2年第二次印刷本印出

封面设计：张良国

使美八年纪要

沈剑虹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1 字数：284,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书号：3003·1670 定价：1.15元

(内部读物)

出版说明

沈剑虹写的《使美八年纪要》一书，是他从一九七一年五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任国民党“驻美大使”期间的回忆录。

其时，正是围绕美国同我改善关系乃至建立外交关系，而与国民党的所谓“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中美两国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书中的观点、看法是站在国民党反动立场上的，并对我进行攻击和诬蔑。但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某些内幕。如果同基辛格的《白宫岁月》、尼克松的《领导者》中有关中美关系的演变对照来看，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本社出版此书，供读者内部参考。

原书所附曾虚白的序和上海公报译文均略去。原书中大量译名均与我习惯译法相异，如侯赛因译为胡笙，约翰逊译为詹森等等，为方便读者，对某些重要译名作了校订。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目 录

前言.....	3
---------	---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中美断交始末.....	7
第 二 章 从再任公职说起.....	22
第 三 章 情势逆转的迹象.....	44
第 四 章 背弃的第一步.....	60
第 五 章 一连串的拜会.....	76
第 六 章 日本与我断交.....	95
第 七 章 过渡性的机构.....	104
第 八 章 基辛格身兼二职.....	121
第 九 章 多事又悲痛两年.....	138
第 十 章 华府最热闹的表演.....	148
第十一章 不诚实的承诺.....	158
第十二章 迅速达成交易.....	173
第十三章 最后的打击.....	182
第十四章 在华府末了两周.....	191
第十五章 台湾关系法.....	206
第十六章 里根就职之后.....	215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中美关系简史.....	223
-------------------	-----

第二章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232
第三章	大使生涯·····	239
第四章	在国会山庄·····	248
第五章	向美国民众演说·····	267
第六章	周恩来为何邀请尼克松·····	275
第七章	中美关系何处去? ·····	284
第八章	中华民国在维护自由中的角色·····	293
第九章	人权问题的回顾·····	305
第十章	美国该与中共“关系正常化”吗? ·····	312
第十一章	美国应有健全的亚洲政策·····	319
第十二章	补充说明·····	328

附录:

一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339
二	中美联合公报·····	340
三	台湾关系法·····	342

前 言

我写这本回忆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我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经历，留下一页记录。使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士，可以在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基辛格已经写过的，以及卡特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可能要写的东西之外，看到由国人所写的关于华盛顿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的真实记录。

我决不是轻易做此决定的。首先要说的是，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担任公职的国人很少在他们离职后就写回忆录。孔子教人谦逊的训诲或许与中国人这种传统有关，即使有人写了回忆录，通常也都有附言规定，要到若干年以后才准发表，或者直到作者作古才得发表。

另一个时常想到的顾虑是，要假以时日，尘埃才能落定。既然写出来也于事无补，何必在一个问题刚结束之后，又重新提起？我不大重视这一类的儒家思想。就我所受过的训练而言，我是趋向于美国方式的。我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就读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生时代，以及其他花在美国的年月（先是一九四〇年代担任新闻局官员，然后是一九七〇年代做外交官），对我的立身处世态度有很大的影响。我在本书中所写的可能是全部的真象，也可能不是；但是，我已尽全力去探求真象。

几十年来，中华民国一直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卡特决定完成尼克松一九七二年二月开始对中国问题所下的功夫时，虽然我国的每一位同胞早就预料会有这一天，这一个打击仍是十分沉重的。我当时身为驻美大使，我不能说我没有责

任。实际上，我回国后在立监两院报告经过时遭到很多质问，指责我未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充分提醒政府提高警觉，就好象消息如能早知道几个小时或几天，就会使最后的结果实质上不同似的。

内人和我于一九七九年元旦返回台北，对我国与美国断交，内心深为悲痛。经过将近八年连续紧张的日子，我们夫妇二人都心力交瘁。因此，我们对给予“大使回部”变换一下生活步调的机会，十分欢迎。回国后第三天，蒙蒋总统经国召见，对我“有辱使命”，不但未加深责，反而安慰我，叫我稍为休息后，到处去看看。一星期后我们就到台湾南部各地旅行。虽然国家遭到一九四九年中共窃据大陆以来最重大的外交挫折，我们所到之处，看到我们的同胞都在勤奋地工作，且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深受感动，不久就重新振作起精神。问题是：我下一步该做什么？答案很自然浮现：何不撰写我的回忆录？

幸好多年来我保存着重要文件、电文，以及我与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要人谈话的记录档案，以及剪报、杂志文章、中美关系研讨会的论文。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用英文完成初稿，然后逐渐修改补充。整体而言，我采用的是按年代叙述法，有时加上前后参照，便于读者了解。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已年满七十，我从外交部退休；二十年前，我身不由己地进入这个单位。我办理退休，一部分原因是要使外交部不必为我所写的东西负任何责任，另一部分理由是如此我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撰写回忆录。

但是，我仍未决定是否要在我仍能看到美国及国内对我所写的美中断交记载的反应时，予以发表。后来有一天，我听说我国的元老政治家张群先生发表了他的回忆录《我与日本七十年》。几十年来，他曾亲自介入战前和战后中日关系的许多事务。张群先生已九十出头，他承认他也会犹豫过是否要发表，担心其中的内容难

免会涉及仍在世的日本显要。但是，他的结论是，中日关系早在数年前中止，当时极机密的事，现也已失去其机密性。他说，此外，他很想留下一页记录，使日本和中华民国的人士都能了解错误在那里，体验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教训。

我认为张群先生的理由十分正确。实际上，我在大使任内交往过的所有美国官员，都还在世。我倒不大在乎他们的反应，既然他们一向擅于评论他人，他们无疑也同样地会接受别人对他们的评论。我比较担心的是国内人士可能的反应。但这是我必须承担的风险，我虔诚希望他们能够谅解。我写回忆录目的只是留些文字，借向国人做个交代而已，丝毫没有为出使失败而辩护的意思。

张群先生是我的老长官，虽然我比他年轻二十多岁，我也已走到一生事业的尽头。正如他毫不倦怠地为维持中日关系而努力，我也在维护中美友谊上尽了我的一份力量。他被形势压倒，我也一样。

我希望这本在卡特承认中共政权并与中华民国断交三年之后发表的回忆录，能够加深一个信念，那就是：美国人民和自由中国的人民是天生的盟友，如果两国间有正常的关系，会同蒙其利，如果长期彼此疏隔，则将同受其害。但愿目前的情况，只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短暂的不正常现象。

沈剑虹 一九八一年八月



第一部

第一章 中美断交始末

至少有一段时间，大家会称我为中华民国最后一任驻美大使。这实在是何等不光彩的名声，我希望中美能早日复交，我就不必再背这个名声了。

中国与美国早在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即已建立外交关系，当时两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国第一位外交使节陈兰彬于一八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向美国总统海斯呈递到任国书。他的官衔是使美兼使日秘钦差大臣。这是明清时代的事。

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成为共和国，但是美国到一九一三年五月二日才承认新的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到一九一四年四月才派专任使节到华府。此人是夏偕复，他当时的官衔是公使。

中美两国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才将双方外交使节的地位升为大使。施肇基博士是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其后各任大使分别为王正廷博士、胡适博士、魏道明博士、顾维钧博士、董显光博士、叶公超博士和蒋廷黻博士——虽然各人条件不同，他们皆是干练的人才。只有我的前任周书楷和我是两个没有一长串哲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头衔的大使。

我在一九七一年四日被任命为大使。一位朋友警告我说，我

可能会成为中华民国最后一任驻美大使。虽然有此可能，但是我还是接受了这个职务。我于五月间前往华府，全心全意要尽最大努力维持及加强中美两国间的关系。不过，我对于我个人及我的国家未来的变化并未存有幻想，因为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恶化。

一九七一年春天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第三十七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第一任期已经过了一半。尼克松了解当时美国的国势衰微，他寻求与苏俄和解。越战已经打了五年，仍无结果，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日益升高。在中国大陆，造成浩劫的“文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两年之前，中共与苏俄的军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冲突。在白宫的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当然认为北平与莫斯科的决裂不仅可以使美国摆脱越战，而且可以使这两个共党国家更加疏远。回顾起来，当时打“中共牌”的构想已经开始成形，似已十分明显。

在一九七〇年后半年到一九七一年的头三个月之间，尼克松采取了许多步骤，对想与中共贸易及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的美国公民放宽限制。但是，真正的警号是他下令第七舰队停止巡逻台湾海峡。这项行动表面上是为了经济上的理由。但是，这种遁辞骗不了任何人，当然更瞒不了我们外交部的同事。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政府决定召回周书楷先生，派我前往华府担任新大使。周书楷先生后来出任外交部长。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先总统蒋公当时下令更动人事时的心意——究竟他需要在台北有一位新部长，还是需要在华府派一位新大使？无论如何，结果周书楷只做了一年部长，而我却在华府任职七年八个月。这就是官场的浮沉吧。

直到今天我不明白，为何在外交部那么多人之中偏偏挑中我担任这个职务。我知道这不是蒋公的意思，因为据当时的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先生说，蒋公也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严副

总统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回答说，鉴于尼克松对北平采取的行动，应该派一位新大使到华府；由于我曾担任蒋公的秘书兼翻译多年，我比其他的人更了解蒋公对世局的看法。那个时候，我已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三年。严副总统为了支持他推荐我担任此职的理由，可能也向蒋公提到我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美国的工作经验、以及我在担任新闻局长五年期间认识许多美国政界及新闻界的要人。严副总统的推荐得到当时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先生的同意。严副总统并且提到我能说流利的英语，发音清晰，语调柔和。据说，蒋公没有再追问下去。我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挑我担任此职不是因为我的种种条件，而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我会毫不迟疑地接受这个职务；鉴于中美关系日益不稳定，换了别人可能会有所犹豫。

学者外交家蒋廷黻博士曾经说过，在美国长春藤盟校念过政治或国际关系的每一个中国青年，都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中国驻美大使。但是，这绝不是我的目标。我心中所想的是准备献身新闻事业，我选择设有著名新闻学院的密苏里大学就读一年半，而不是到长春藤盟校去念书。但是，由于种种情况，一九七一年春天政府需要一位驻美大使的时候，我正好是现成的人选。外交部长魏道明先生把蒋公的最后决定通知我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推辞；在一般情况下，多半的人都会有这种表示。

我于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抵达华府。我在杜勒斯国际机场告诉在场的中美记者，我坚信中美两国除了对自由与民主有共同理想之外，而且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其中包括维持东亚的和平与安定。我指出，基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双方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华民国与美国彼此是盟友。这项条约是东亚离岛弧形锁防线中重要的一环，此一集体防线是美国与西太平洋国家在朝鲜半岛停战之后合作建立的。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八日上午，我在白宫向尼克松总统呈递到任国书。在简短仪式后的交谈中，我向尼克松保证，我将尽一切力量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他的态度非常诚恳，并且提醒我，他与蒋公伉俪有深厚的友谊。但是，后来的发展显示，就在那一刻，他已经和基辛格秘密策划与北平接触的方法。

我在华府担任大使的第一个任务，是敦促美国政府在为确保我国联合国席位政策上，继续采取坚定立场。自一九四九年政府迁台以后，几乎每年都会遭遇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美国及其他许多自由国家的协助，每年我们都设法保全了席位。然而，在加拿大于一九七〇年十月承认北平政权后，情势即转为危急。

在我启程往华府之前两周，尼克松派资深外交官墨菲前来台北，探询我国对允许中共进入联大、并同时维持我国席位这个构想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双重会籍”案。为了使我国更乐于接受，墨菲向蒋公暗示，只要与美国合作，我们就可以保全我国在安理会的席位。他说，甚至有一种可能，即中共拒绝入会；在此种情况下，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至少在一段时日内不会改变。

蒋公表示，假如美国不支持北平入会的提案，又假如美国再次领导联合所有看法相同的国家支持所谓“重要问题”案（即需联大三分之二会员国同意才得排除一个会员国），他愿意遵照美国的计划行事。蒋公并且提醒墨菲，肯尼迪总统曾保证必要时将使用否决权，维护我国在联大的席位。

美国在制订最后立场之前，曾拖延数周之久。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松突然宣布，基辛格已从北平秘密访问归来；尼克松并且表示，他本人已接受周恩来的邀请，将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国际外交界立刻认为，这是美国即将在中国政策上作重大改变的征兆。在一九七一年十月，联合国大会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不知是因为巧合或有意安排，基辛格突然赴北

平作第二次访问。表面上此行是为了安排尼克松访问北平之行，但尼克松实际上直到一九七二年二月底才成行，距当时还有四个月。无论如何，基辛格此行使得许多原先欲投票支持“重要问题”案的国家认为，支持此案已无用处；因为该案的主要倡议者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政策已经动摇。十月二十五日，当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重要问题”案先行表决时，我国以极小的差距失利，在阿尔巴尼亚所提的排我纳匪案交付表决前，周书楷外长即率领我国代表团退出联合国。如一般预料，中共很快的获准入会，美国支持的“双重会籍”案即胎死腹中。美国原来可能是怀着一片好意，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什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之间怎么可能会有如此令人难以相信的缺乏协调的现象，却没有人能向我们提出满意的解释。布什正在尽力维护我国在联合国中的权益时，基辛格却在北平接受他的中共朋友酒宴招待。

我国退出联合国后，国际地位即告下降。几乎在一夜之间，有二十多个国家和我国断交，转而承认北平，无视于联合国排我之举显然是违反宪章及违反该组织建立宗旨这一事实。

自从一九四九年政府迁台以来，我国外交政策即有两项基本目标：第一是维持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第二是维持我国与美国的关系。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缔结后，第二项目标变得更为重要。虽然我国政府主管官员未曾明言，但一致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同时保有两者，我们宁愿放弃在联合国的席位，也不愿让中美关系发生任何变化。在我们退出联合国之后，我国政府自然集中一切努力加强我国和美国的关系。我的职责就是要加强这种关系。

和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访问中国大陆的“震荡”相比，他一九七二年二月的北平之行重要性已经大减。由于在他成行前几个月，此事已被大肆宣传，以致在他成行时，大多数人已

视此事为一盛大的新闻事件，而非对东亚地区人民将有重大影响的外交事件。

尼克松自夸说，他在中国大陆访问的那七天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却没有说明，这一改变是朝好的方向或是坏的方向改变。他向毛泽东及周恩来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使我想起历代向中国皇帝朝贡的外邦使臣。中共头目在和尼克松会晤时，一定暗自窃笑尼克松这种行为。

尼克松在结束访问中国大陆之行时，于二月二十八日和周恩来签署“上海公报”，成为美国和中共于七年之后达成关系正常化的先兆。“上海公报”是外交史上一项极不寻常的文件，由一名美国总统和一个美国尚未承认的政权的首脑签订。在一般情况下，它甚至不具有行政协定的效力。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它对美国政府产生的效力，比一项经由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条约还来得大。后来，到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它甚至导致美国废除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在“上海公报”中，尼克松和周恩来除了表示两国各自的立场外，并同意推动中共及美国迈向“关系正常化”、降低国际间军事冲突危险、不在亚太地区寻求霸权以及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此种霸权、不代替任何第三者进行谈判、彼此不和任何第三方达成协定或谅解来对付对方。

“关系正常化”的意义是指什么？虽然在“上海公报”中，这一名辞出现不下四次，却未给予定义。也许尼克松和基辛格是故意要使这一名辞的意义含混不清，但后来这一名辞却被中共玩弄利用。不久之后中共即宣称，在“上海公报”中，美国政府已承诺和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并从台湾撤出所有的美军及军事设施。虽然尼克松在白宫主政期间尚未能作到以上各点，但他已为卡特铺路，使卡特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一一实

现。

尼克松访问北平之行及签订“上海公报”之举当然使我国政府深感不安。我接获指示，要尽快向尼克松当面要求澄清及保证。我在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与尼克松会晤。尼克松一开始就告诉我：“大使先生，贵我两国之间有一项共同防御条约存在。请转告贵国政府，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

尼克松当时对我所讲的话中，另有一段值得注意：“上海公报不是一项条约，仅是一项共同声明，双方就各项问题表示本身的立场，并未试图达成协议。”他说，他和中共并无任何秘密交易。又说，他不是那种背着他国而去谈判他国命运的人。

尼克松说，在台湾问题上，他向周恩来强调了美国政府的立场——这一问题应由和平方式解决，实际的解决程序要由直接有关的双方自行决定。我问道：“周恩来有没有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尼克松回答说：“没有。”

和尼克松这番不寻常的晤谈后，我第二天即飞回台北，向先总统蒋公提出报告。他看起来神色凝重，但未显出不安的样子。从他的垂询中，我可以看出他已看过我拍回的电报。在这次晋见结束时，他说：“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这使我想起他于一九七〇年对来临的横逆所提出的警告，他呼吁全国人民要“处变不惊、庄敬自强”。

三月下旬，我返回华府任所后不久，美国和中共驻法国“大使”即在巴黎举行会谈。这是他们多月以来的第一次会谈，引起我的关切，尤其是因为这次会谈是紧接在尼克松访问北平之后。我奉命按照以前的作法，要求美国国务院简报这次会谈的内容。国务院的答复很含混，只告诉我：“只谈论了些不重要的问题。”这更引起我的猜疑。所以我要求会见基辛格。他一直拖到五月三日才见我。他说，那次会谈的内容不包括政治问题，只商讨了有关医学及